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穆勒政治经济学 概述

[俄]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 著





2 021 8002 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穆勒政治经济学 概述

[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 著

季陶达 季云译



商务印书馆

1984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

〔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 著

季陶达 季 云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4017·277

1984年10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96 千

印数 7,900 册

印张 10⁵/₈；插页 4

定价：1.55 元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3年5月

译 者 序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年)是俄国的革命家、思想家、作家、文艺批评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处在俄国农奴制衰落和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毕生从事革命运动,为反对沙皇和农奴制而斗争,是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述很多,他的文学名著《怎么办?》对俄国当时的进步青年发生过重大的影响,使他以文学家知名于世。他也写了许多哲学、经济学和其它方面的著作。他的经济学著作有:《土地所有制》(1857年)、《农村生活的新条件》(1858年)、《批判反对村社所有制的哲学成见》(1858年)、《论农奴农民赎地的方法》(1858年)、《赎买土地困难吗?》(1859年)、《经济活动与立法》(1859)、《资本与劳动》(1859年)、《对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的注释》(1860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1861年)、《没有收信人的信》(1862年)^①等。1862年7月,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长期被流放在西伯利亚。

《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一书,是有关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的一部重要著作。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特别提到它,马克思说:“1848年大陆的革命也在英国产生了反应。那些还要求有科学地位、不愿单纯充当统治阶级的诡辩家和献媚者的人,力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于是,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最著名代表的毫无生气的

^① 这是一本论述农奴制问题的论著。马克思在阅读这本书时,以“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问题”为题,对书中的内容作了详细的摘要。

混合主义产生了。这宣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关于这一点，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尼·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中已作了出色的说明。”^①

我国过去没有出版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部经济学著作的中译本，对于马克思说的这一段话，我们理解得很不够，或者说，不完全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怎样评述小穆勒的经济学的。1954年，我在南开大学和其他两位同志共同讲授《资本论》时，《资本论》的导言由我讲授。备课过程中，我想除了应该讲述《资本论》的著作的目的和叙述方法、它的体系和结构等一般的问题以外，还要着重讲述《资本论》的几篇序言和跋文。在研读到第二版跋文中有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上面所引的一段话的时候，因为没有书，就没有能洞悉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怎样通过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经济学概述的出色说明，来宣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的。当时因没有这本书中译本，又找不到车氏原书，后来又由于别的许多原因，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使我的讲课欠下一笔没有偿还的债务，我也一直把它放在心上。1980年冬，商务印书馆约我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一译作任务。我想，这不仅是译一本书，而也是还一笔债。现在，我把这个译本献给广大的读者，特别是那些研读《资本论》的读者，这是我长期以来没有放下的一桩心事，一个为《资本论》的第二版跋文中的一个问题寻求讲解的一个虔诚的宿愿。

这个中译本是根据 И.Д. 乌达利卓夫主编、由 С.В. 巴西斯特整理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经济著作选集》的第三卷第二册译出的。该书于1949年由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书名为《评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即《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所说的《穆

^①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18页。

勒政治经济学概述》。

车尔尼雪夫斯基评述的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于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于社会哲学之应用》——简称为《政治经济学》一书。约翰·穆勒的这部著作包括5卷,第1卷为《生产》。可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概述》没有对于《生产》这一卷的评论。据序言中所说:对《生产》的评论早已在《同时代人》杂志上发表。这本评论因篇幅过大不宜在杂志发表,所以才出了单行本。C.B.巴西斯特在整理出版这本书时,没有把在《同时代人》杂志上发表的有关生产的评述收入这个单行本,使读者得窥全貌,未免是一件憾事!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实事求是地评论约翰·穆勒的经济著作的,在本书中,他既肯定了约·斯·穆勒的优点,同时也指出了他的缺点。在“所有制”一章中讨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时,他指出,穆勒并不象蒲鲁东那样狂妄自大,而是“非常冷静地看待使别人非常害怕的理论,并且没有从其中看出什么可怕的东西。他在重新考虑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异议之后,连一条有根据的异议也没有发现。他关于共产主义的最后结论是:……目前这种形式的私有制远不如共产主义。他对社会主义寄予更多的同情。不但没有从中发现什么不好的,而且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妥当的。他只提出一个疑问:当前社会道德水平非常之低,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人们是否有能力接受任何良好的制度呢?”(第16页^①)

在这个问题上,他也随即指出穆勒的缺点。他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穆勒表示对新的分配原则(穆勒指的是共产主义分配原则)犹豫不决地赞同之后,又找借口回避它。说什么研究这些为时尚早,而应当深切注意原有的分配原则,能否把它修改得比新的原则更好。穆勒承认,它现在的形式远不如新的。”(第34页)穆勒的

^① 为本书页码,下同。

改良主义思想就是从此发生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反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产品三项(工资、利润和地租)分配的,他认为在这种制度下,不仅工人遭受剥削,而且也阻碍着社会经济进步。因此,他很称赞自耕农制度。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劳动者同时又是主人,其所生产的产品完全为他自己所有,因而会发挥生产的积极性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他认为由亚当·斯密所创建的经济理论是在“一个不知道存在自耕农的社会里产生和发展”的。(第106页)因此这个理论就没有研究过自耕农制度。这是这个理论的一个空白。无论马尔萨斯还是李嘉图(由于车尔尼雪夫斯基还不知道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之区别,所以他往往把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相提并论。)都没有填补过这个空白。他认为穆勒也不能填补这个空白,因为穆勒的“主要力量在于他是真正诚实的思想家和支持做好事的人。要他摆脱其导师马尔萨斯、特别是李嘉图建立的观点是办不到的。他只会评价从这个观点观察到的一切美好的东西。”他把“工人—主人的地位认为是唯一正常的。作为善良的人,他深入这个观点并发现它是正确的。因此,在任何适宜的场合,他都表示希望工人能提高到主人的地位。”(第106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部著作中,没有专门论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阶级性问题的章节。但在事实上,他已明确指出,穆勒只是站在资本家的立场说话的。他的论证是既特别而又颇有风趣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批评家,他对批评的对象,不仅注意到其中说了些什么,还注意到其中对什么没有说。他是用这个方法发现斯密学派没有研究过自耕农制度这个空白点的。他也用同样的方法发现穆勒的著作的阶级性。他极明确地指出:如果只带检验穆勒所论述的一切是否正确这样一种想法去阅读他的著作,则

在读完他的分析时，会找不出他的任何错误。如果你用另一种比较广泛的想法再去重读那些篇章，并注意考虑一下：穆勒的分析是否有疏漏？你就会发现重要问题。他引证了穆勒的这段话：“所生产商品数量的这些变化不要求任何人改变自己的职业。如果事业进展得非常顺利，可通过加紧利用信贷来扩大生产；如果生产进展不顺利，则可通过缩减业务范围和减少工作时间来缩小生产。”（第 189 页）他并且举例说明：假设有一个制造呢子的工厂，有 500 个工人工作。在这个企业经营得很顺利，盈利很大时，不必建造新工厂，从事其它业务的资本家也不必改业而成为呢子工厂主；原来的呢子工厂主把生产规模扩大 1 倍，从而生产出多 1 倍的呢子就可以了。如果该企业没有盈利，他也没有抛弃自己业务的必要；他只要减少自己的业务，只生产一半的呢子就可以了。所以资本家谁也没有必要去改变自己的职业。车尔尼雪夫斯基根据这种情况，做结论说：“如果我们指的只是资本家，穆勒说得完全正确。可是工人呢？工人也是这样吗？如果呢子工厂把生产扩大 1 倍，它将雇佣 1,000 个工人而不是原先的 500 个。新增加的 500 个工人是从随便什么其他行业转到呢子生产上来的。如果工厂的生产缩减一半，它只雇佣 250 个工人来取代原先的 500 个。其余的 250 个工人必须放弃呢子生产而转向其它行业。可见穆勒的言论对工人是不适用的。他的‘任何人’只指资本家。而他的工人‘却一个也没有’！他完全忘记了工人。”（第 189—190 页）。车尔尼雪夫斯基还说：在穆勒看来只注意到资本家便是一切了。“顺便说说，资本家也是真正的生产者；工人只不过是资本家的附属物；看问题还值得涉及他们吗？”（第 190 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虽然受过很好的教育，知识广博，逻辑性也很强，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没有什么偏见，毋宁说他还是满怀喜悦地谈论这种新的生活制度的。

但是穆勒终究不是第一流的思想家，从而不可能使政治经济学向科学方面前进而创立新学说。他说：穆勒“不是在未来学派中培养出来的。所以当他了解该学派的时候，重新建立理论，对他来说，已经太晚了。因为旧学派的学说已经根深蒂固地扎进他的思想中了。在他的头脑中给新概念留下的位置太少了，因为它已被旧概念占满了。然而按照他自己的诚实和富有生气的天性，他总是同情改进的。所以，如果他的几乎全部个人智慧都已经消耗在以前的事业上，用在掌握和发展以前的概念上；那末他会愉快地用其余力来掌握新概念。对他来说，重新学习已经为时太晚了——但是已经定型的人能够重新学会什么，他就努力学习什么。”（第304页）

从上述根据车尔尼雪夫斯基这部著作所做的说明，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点：

第一，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首先是一个以资本家的立场发表议论的经济学家，他有时会对工人阶级视而不见。例如在讨论某种资本主义企业（比方说制呢工厂）因某种原因而扩大或缩减时，在他的心目中只有资本家而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对于工人的影响。

第二，穆勒虽然主要是站在资本家立场上说话，但另一方面，他既赞扬自耕农的生活方式，又反复强调工人成为主人的重要性。因此，如果把他毫无区别地包括在一心充当资本家阶级的诡辩家和献媚者的人们的行列，似乎也是不公平的。

第三，约·斯·穆勒并不仇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反而承认这种新制度比十九世纪中叶在西欧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可是同时他又认为当时实行着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可以改进的。不过改进后的私有制同共产主义究竟孰优孰劣，他认为在当时还不能判断。因此，他又醉心于改良当时实行着的资本主义制度。这实

实际上是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无产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从而产生了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

第四，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约·斯·穆勒只能阐述其先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尤其是李嘉图的学说，他的脑袋已被这些旧学说占满了，已没有容纳新概念和新学说的余地！这就是说，约·斯·穆勒所祖述的其先辈的学说，传到他这里停滞不前、僵化了，从而就破产了。

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穆勒经济学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通过这样的评价，读者无疑可以体会到，由威廉·配第奠基、由亚当·斯密建立、由李嘉图完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十九世纪中叶，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特别在 1848 年的大陆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已经不再能够发展其科学性的一面了，即使象穆勒那样的“不能把他和庸俗经济学的辩护者流摆在一起的人，也只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使他们的理论成为“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穆勒经济学的评价出色地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译用了大量的穆勒原文，译文占全书的 40% 以上，成为这本经济论著的一个特色；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本身兼有的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的才识和写作方法，又往往在行文中表现出特殊的魅力，使读者不仅易于理解，而且随处可以感受到车氏的幽默，产生极大乐趣。限于篇幅，我就不具体介绍了。

季陶达

几点说明

一、本书著者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著作很多，涉及的范围很广泛。我们翻译的这本书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所说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

二、我们所根据的是由И.Д.乌达利卓夫主编、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于1949年出版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经济著作选集》第三卷第二册《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这本《概述》是由С.В.巴西斯特整理出版的，“注释”也出自他的手笔。

三、原书包括四部分：1、序言；2、正文；3、注释；4、附录。正文又包括四个部分：1、分配；2、交换；3、经济进步；4、政府的控制。

四、本中译本只译述了原书正文中前面三个部分。其中有关“分配”部分，我们删节了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为维护村社土地所有制的引文和议论，因为这些论文仅对研究十九世纪中叶俄国土地制度才有用处。此外，第三部分“经济进步”的最后一节“经济进步的前景”也全部略去了，因为这一节全是翻译小穆勒原著，他自己已申明不发表评论。

五、本书注释有二类，第一类巴西斯特加的注释集中于全书末，第二类有三种：1、穆勒加的；2、车尔尼雪夫斯基加的（简称“车注”）；3、编者加的。中译本还加上译者的注。

六、书末的注释次序，全是原书的次序，未作更动，这便于读者查对。由于有些内容已删去，因此，注码有空缺。

七、无论我自己三十年代译的苏联当时最广泛采用的奥斯特

洛维季扬诺夫和拉皮杜斯合著的《政治经济学》第七版和第八版，还是五十年代苏联科学院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是以 *стоимость* 一词表示价值，都没有使用 *ценность* 这个词。可是，在本书中却屡见 *ценность*，我们查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译文与穆勒的原文才弄清楚，原来是这样的：*ценность* 即 *value*，*стоимость* 即 *cost*。希望本书读者在对照俄文原著时注意这一点。

八、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本著作，译述穆勒原著很多，约占全书40%以上。这位大学问家挺有意思：有的英文，如 *workhouse*，他不译而只拼音；有的如 *allotment system*，他干脆用原文，并说明因为俄国没有这种制度，还是用原文好。对前者，好办；对后者，很伤脑筋。虽然这种办法及其意义，书中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我却找不到我们中国自古迄今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曾经采用过这种办法。曾想音译，觉得也不太合适。思考再三，暂把它译为“配地制度”。不一定合适，特举出请读者不吝赐教。

九、本书译文的初稿，是由我和季云同志共同完成的，主要是由季云同志于业余时间译的。而校对、查对英文原文及其它外文（如意大利文和法文）、修改、审阅和定稿，主要由我负责，所以文责主要由我承担。

十、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李毓珍同志的帮助，尤其胡企林同志曾提供宝贵意见，统此致谢。

十一、为能力所限，本译本不妥甚至错误之处，由衷地恳请读者指正。

季陶达

《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¹

目 录

分 配	3
论财产所有制	3
阶级,阶级之间的产品分配	46
甲、竞争作为分配的准则	46
乙、在私有制原则下按照竞争原则或更加不满意的经 济计算标准的产品分配形式	80
产品的三项分配	106
工资	114
利润	141
地租	155
交 换	170
价值与生产费用	170
甲、购买力	211
乙、价值波动与价值尺度	237
丙、商业	255
丁、分配概要	267
经济进步	273
甲、经济进步对工资、利润、地租、价值和价格的影响 ——静态	273
注 释	305
人名表	325

分 配

(穆勒,第二卷^①)

论财产所有制³

(第一—二章)

默守成规的政治经济学家都一律认为经济生活的一切方面按其基本特点与人类生活较好安排的观点无关。事实上,只有经济生活的一个方面的原理,那就是生产的原理,是由自然规律的必然性强加于人的;至于经济生活的其他方面则是由人们自己规定而且完全受历史环境的控制。穆勒从著作的第二卷开始阐述生产论同分配论和交换论的重要区别。

本书第一卷所说明的原理,在某些方面,同现在将要考察的一些原理是大不一样的。生产的规律和条件具有自然科学所说的真理性质。在这方面,既不能任意选择,也不能随便改变。人们所生产的一切,都是根据外部自然环境和人们自己物质和精神情况的内在性质所规定的方法和条件生产的。不管人们愿意或不愿意,但是他的生产规模都是由他的事先储蓄量所决定的。在该储蓄量内,他的生产规模应同其能力、技巧、所用工具的优点以及明智地利用联合劳动的优点相一致。不管人们愿意或不愿意,如果不改进农业过程,则投入加倍劳动决不能在该耕地上获得加倍的粮食。不管人们愿意或不愿意,各个人非生产性开支将要引起社会相应的贫穷,只有生产性支出,才会使社会富裕。不管人们对于这种事物的看法和愿望如何,他们不能改变这种事物的性质。我们不能预言:当将来我们在自然规律方面的知识扩大以及从这

^① 指约翰·穆勒著《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卷。——译者

些新知识产生新的工业过程——现在我们甚至还不懂得这些——的时候，改变生产方式和增长劳动生产率究竟不能超过什么界限。但是，不管我们在努力扩大事物性质所规定的界限方面取得多么大的成就，我们知道，这种界限必然存在：我们既不能改变物质的基本性质，也不能改变思想的基本性质。我们只能在制造我们所需的事物(events)时不同程度地利用这种性质。

财富分配的原理就不是这样了。分配——这纯粹是人类制度问题。一有财物，人们或者作为个别的人，或者作为集体，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处理它们。它们可以把它随便交给任何人并随意规定条件去支配。其次，人是在社会中生活的。所以，任何财物的支配，只有通过社会的赞同，或者更准确地说，只有通过那些对社会具有积极作用的人的赞同，才能进行；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除非是只孤单地在荒漠中生活，这种赞同是必不可少的。甚至连只靠自己个人的劳动、不用任何人帮助而生产出来的物品，要是得不到社会的许可，他也不能留归己有。而且，如果社会对此漠不关心，如果社会不在全体成员中进行干涉或不委派也不雇用一些特殊的人物来防止任何人破坏他的所有权的话，那末，社会就能拿走他的产品，而且某些人能够并且也会把它拿走。所以，财富分配决定于社会的法律和习惯。决定分配的法规是根据统治社会的那部分人的看法和心愿制造出来的；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这种法规是大不相同的。假如人们想这样做的话，还会和先前的更不相同。⁴

当前文明社会产品分配的各种制度中，私有财产制度占统治地位。现在当它盛行的时候，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面的人们以外，所有的人都肯定地说，维护它是为了它的效用。但是，它的产生，并不是出自考虑它对社会有什么好处，而是由于占有物品并随之为法庭所承认的这个事实。没有理由要破坏这个事实，所以也没有必要反对它；后来这种公认的事实就载入法律里了。但是穆勒已在上面指出，私有财产制度并非经济生活唯一可能的形式。历史、甚至当代的生活都已提出其它制度的实例。根据其他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规模是很小的。但是，在强烈地唤起人们努力去检验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的时代，却引起了学者的注意。涌现了

不少思想家，引起了他们的关注，他们根据这些实例，为人类提出了他们认为优于现行制度的经济生活制度。

最近欧洲的变革引起许多这类性质的思考，以致非常注意这些思想所采取的各种形式，这种注意力不能认为已经减弱，恰恰相反，它越来越增强了。

反对私有财产原则的人可以分为二类：一类人计谋在生活和享乐的物质资料分配方面绝对平均；另一类人虽容许不平均的存在，但认为必须以某种真实的或臆造的公正或公益的原则为依据，不能象现在许多社会不平等现象那样，只以偶然事件为依据。在第一类人中，我们首先应当举出欧文及其追随者。因为在这一代人中，欧文比谁都更早地提出这种意见。在欧文以后，则路易·勃朗和卡贝以这种思想的信徒而知名（虽然路易·勃朗认为分配的平均不过是向那种要求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更高公平原则过渡的手段）。这种经济制度叫做共产主义；这个名称不起源于英国而起源于大陆，最近才传到英国来。社会主义这个名称是英国共产主义者提出来用以表达他们的制度的，目前，大陆以更广泛的意义使用这个名称；把社会主义理解为这样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既不要求实行共产主义，也不要求完全废除私有财产，而只要求土地和生产工具不成为个人私产，而归社会或团体或政府所有。在这些体系中，负有特别崇高的科学声望的有两派：圣西门主义和傅立叶主义，都是人们以他们的实际的或传说的创始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圣西门主义作为独立的体系已经过去了，但在它公开传播的短暂时期，它对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倾向播下的种子，现在还在法国广泛地传播着。傅立叶主义有很多信徒，可为他们的才华和热忱而自豪。

不管我们怎样设想这些各种各样的计划的优点或缺点，但硬说它们不能实现，是不公平的。每个有理性的人都不怀疑，由数千人组成的村社，按照公共掌握至今还养育他们的土地的原则进行耕种，采用最完善的方法，是能够生产出满足这些人舒适所需要的工业品的；也不怀疑，村社能找到一切办法来获得并且在有必要时可以强使每个有工作能力的成员完成达到上述结果的劳动量。

反对公共财产和产品平均分配制度最流行的异议是：每个人总是力图逃避他应当完成的那部分工作的。这种异议提出了实际困难，但是提出这种异议的人忘记了，现在在社会上完成的十分之九的劳动所借以进行的制度之

下，也会存在如此大量的同样的困难。这种异议认为，只有自己能享用自己努力所获得的成果的人，才会认真而有成效地劳动。而在英国为自己私利而工作的人所从事的劳动生产是何等的少，从最小报酬到最大报酬的各种为私利的劳动又是何等的少。从爱尔兰的农夫和小工到最高法官和国务大臣，差不多在社会上所作出的一切劳动都是以日薪或一定薪水报酬的。工厂工人在自己劳动中所含有的个人利益要比共产主义协会的成员少一些，因为他并不象共产主义协会的成员那样为协会的利益而工作。当然，对此可以说：工人本身固然在他自己劳动中几乎从来没有过私利，但是对此有个人利益的人们却监督着他、指挥着他劳动，并且进行着脑力劳动。不，远不是在一切场合下都是这样的。但是，在所有公共企业和许多最广泛最成功的私营企业里，不单是粗活，就连检查和监督都是交给雇员干的。当主人是细心操劳和有能力的，俗语证明：“主人的眼睛”是有用的。但是应当记得，在社会主义的农场或工厂里，每个工人不是在一个主人、而是在公社所有成员的主人眼睛注视之下工作。对逃避规定劳动的顽固态度这种万不得已的情况，公社也会有办法，就和现在社会为了强制人们遵守社会关系的必要条件所采取的办法一样。现在面对这种情况有一个办法——辞退不称职的工人；但当任何其他工人并不比其前任更好地工作时，这种办法就失效了。不称职的工人辞退了，主人只能得到普通的劳动量，而这种普通劳动可能是毫无成效的。由于懒惰和马虎而失去自己职业的工人在最坏的情况下也没有什么受不了，只是必须忍受贫民习艺所（workhouse'a）的纪律。如果在当前制度下想逃避这种命运，甘愿去劳动，那末，这在共产主义制度也就足够了。由于特别勤奋而产生的全部利益或大部分利益归工人，以此来鼓舞劳动的一切力量，我是十分重视的。不过在当前的工业制度下，多半没有这种鼓舞。如果说，共产主义劳动不如为自己利益而工作的自耕农和手工业者勤奋，那末，他大概要比在工作中完全没有个人利益的雇佣工人更勤勉些。在现在社会条件下，最明显的事实造成了照例完成自己义务的雇佣工人的没有教化阶级的漠不关心。而共产主义计划规定大家都必须受教育；在这种条件下，协会成员实行自己义务时，无疑会象中层和上层的大多数雇佣职员那样勤奋；可是这些职员都没有这种声誉，好像他们成了敷衍塞责的人，因为只要不离开职守就可以获得同样的一定薪水，而不管他们执行自己义务时多么马虎。固然，一般地说，支付一定薪水不能使任何一级职员尽心竭力，难道仅凭这一点就可以反对共产主义劳动吗？

然而，难道可以说，他一定要容忍这个缺点吗？这并不是象很少考虑跟他所熟习的制度不同情况的人所想象的那样毫无问题。人们能够理解社会精神的程度，要比现在习惯猜测高得多。历史证明，许多人类团体习惯于把公共利益看作自己的利益。共产主义协会是发展这种感情的最好土壤。因为现在光顾自己局部利益的名利心和一切体力和脑力工作，那时，就会找到另一种环境，自然也会关心协会的公共利益。在共产主义之下，公民同公社联系着，其原因正如人们解释天主教神甫或修道士忠于自己阶层的利益所说的：他没有不同于公共利益的利益。不论同情公共利益与否，协会的每个成员都要服从在个人动机中最普遍、最有力量、最有权威的权威——公众意见的权威。谁也不会提出异议，这种动机极其有力地制止我们的被社会彻底指责的行为。竞赛也鼓舞着以最大的毅力赢得别人的赞扬和惊讶；人们彼此之间公开竞赛的一切场合证明了这一点，虽然竞赛的对象还空着或对于社会并无好处。社会主义者绝不反对谁为公共福利做更多的竞赛。那末，共产主义是否大量减少了劳动毅力，以及总共减少了多少——应该认为，这个问题目前尚未解决。

反对共产主义的另一异议与经常反对救济贫民法一样，声称：如果每个社会成员，在同一条件下，只要他不拒绝工作，不论他有几个孩子，都能保证供养自己和所有的孩子，那末，人们将不按理智控制生育，因此人口将按这种比例增长，以致社会经过日益增长的贫困时期将由于饥饿而走向死亡。的确，如果共产主义不能控制人类生育，这种担心是有根据的。不过，共产主义正是社会舆论最有力地反对生育无政府状态的一种社会制度。人口增长使舒适减少或劳动力增加，也将直接和明显地不利于每个人（目前尚未如此）；这种不利情况既不能归罪于资本家的吝啬，也不能归罪于富人不公平的特权。在这种变化的环境中，社会舆论一定会象反对其它一切有损于团体利益的无节制那样反对它，而且假使谴责还不足以消除损失，社会舆论将以任何惩罚来清除这种无节制。不能根据人口过剩会带来危害，把反对意见强加于共产主义理论；恰恰相反，共产主义理论能够有力地制止这种灾难。

难以在协会成员之间公平分配社会劳动，这一异议较有道理。劳动极不相同，我们应按什么标准来衡量一种劳动与另一种劳动呢？谁能评判纺多少纱或从商店出售多少商品，或砌多少墙和清扫几节烟囱等于耕多少地呢？共产主义作家深感很难平分不同质的劳动，因此大部分作家认为有必要让每个人轮流从事每种有益的劳动；而这种制度不再进行职业分工，将减少生产协作的好处，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大为降低。同时，即使在同一事业里劳动表面

上相等而实质上如此之不平等，以致会引起公愤来反对这种要求。并非每个人都同样地胜任一切劳动，而等量劳动对于弱者和强者、灵活者和笨手笨脚者、愚人和智者，都是不同的负担。

然而，即使这些困难确实存在，也不见得不能克服它们。按人们的气力和能力分配工作，缓和一下变得严厉的常规——这些并非具有正义感的人类智慧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同时，在力求平等的制度下，即使最差的、最不公正的劳动分配与当前不平等不公正的劳动分配（且不谈当前的分发工资）也相差如此之远，以致不值得与当前的不公平相提并论。还应该记得，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仅在理想中存在，现在看到的困难比克服它的办法要多得多，而人类智慧才开始想到组织共产主义的详细办法，以便战胜困难并从中得到最大利益。

因此，如果要在共产主义及其一切冒险性与现在的社会状况及其一切苦难和不公平之间进行选择，如果私有制存在的必然后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劳动产品分配——几乎总是与劳动成反比例，结果绝大部分落到完全不劳动者的手里，其次，剩余的大部分给几乎只是挂名的劳动者，并按递减的百分比分配，以此类推，劳动越沉重越不痛快，报酬则越少，直到最后，最疲劳最繁重的体力劳动者连维持生活第一需要的报酬都没有把握得到——如果只在这种状态与共产主义之间进行选择，那末，不论共产主义有多大困难，这些困难在进行对比的天平上不过是一粒沙子罢了。但是，为了对比恰当，我们应该比较共产主义的最佳形式和私有制可能达到的最佳状况，而不是现在这种状况。实际上，私有制原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按适当的形式经过考验，而在英国则未必比某些其它国家经受的考验要多。新欧洲各国的社会制度是从财产分配开始的，它不是任何公平分配的结果，也非劳动所得，而是侵占和暴力的结果；尽管多少世纪以来，劳动重建了暴力建立起来的一切，现在的制度仍然保留了其许多重大的原始痕迹。至今财产法还没有符合承认私有制是合法的那些原则。这些法律已经把那些无论如何不应成为财产的东西变为财产，并且把那些只有在制约条件下才成为财产的东西变为无条件的财产。这些法律不能公平地对待不同的人；它们使一些人陷入困境，而使另一些人得利；它们故意庇护不平等，并且妨碍每个人以适当的方式着手工作。要让所有的人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开始工作，这与私有制法律是不相容的。但是，假如在不动摇原则本身的前提下，对减少该原则自然作用所产生的不平等，就像扩大不平等的机会那样，给予各种各样的关注；假如法律力图使财

富分散而不是集中,帮助其大量分散而并不力求防止其分散,那末,实际上,并不像几乎所有的社会党人作家认为的那样,私有制原则同物质的和社会的贫困这一必然后果不可分割。

保护私有制时,几乎所有保护它的作者都认为,它保证谁劳动谁就得到劳动果实;谁储蓄谁就占有储金。当个别人占有别人的劳动果实和储蓄而不作任何贡献、不花任何气力时,这已经不是私有制原则的实质,而只是它的偶然后果,这种后果在其一定的发展阶段,不是促进而是妨碍私有制合法化的目的。为了评论所有制的最终使命,我们应当假定:一切违背报酬和劳动之间成比例的公平原则的因素,违背以对私有制有利的经得起批评的论据为基础的原则的因素,都已经排除了。于是,我们应当假定存在两个条件,没有这两个条件,无论在共产主义或其它任何法律和制度之下,人民群众的境地必然卑贱而又贫困。第一个条件是普及教育,第二个条件是适当控制人口。有了这两条,即使在现存的社会制度之下也不会有贫穷;要是假设存在这些条件,正如社会主义者常说的,社会主义问题已不是摆脱现在压迫人类的贫困的唯一出路问题,而仅仅是什么样的制度更有利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应当在将来解决。关于个体活动在其最好形式之下和社会主义在其最好形式之下能够完成些什么,我们知道得太少,因此我们还不能指出其中哪一种制度会成为人类社会的最终形式。

要是敢于猜测,那末,答案也许主要取决于哪一种制度允许人们之间有最大的自由和独创的活动。保证了食品供应之后,人类最强烈的个人欲望是自由。随着文明的发展,物质欲望变得比较适度,也比较容易受理智控制。而随着精神才智的发展,对于自由的渴望将会更加强烈而决不会减少。理想的社会制度和实用的道德就是保证一切人们行动完全独立自由和不受任何限制,并且不危害他人。由于所受的教育,或由于社会制度的要求,人们为了舒适或富裕而放纵自己的行动,或为了平等而不要自由,人们会丧失最崇高的人类禀性之一。应该分析一下,共产主义社会组织在什么程度上保留自由与独创的活动。毫无疑问,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的这一异议,就和反对它的其它异议一样,过分夸大其词了。协会没有必要强迫自己的成员彼此之间有比现在更多的共性,也没有必要监视他们之间谁的个人产品和休息时间可能多些,如果协会只限于生产确实值得生产的产品,休息时间是会很多的;协会没有必要把人们固定在某种职业或某个地方。与当前大多数人的状况相比,共产主义的约束就会是自由的了。在英国和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差不多全部

工人阶层，选择自己职业或居住地点的可能性是如此之少，实际上他们如此依存于规定的法律和别人的意志，以致他们能享有除非在纯粹奴隶制度才有的一点点自由。我就不谈关于家庭中女性完全服从男性的问题了。欧文主义和差不多所有其它形式的社会主义(应该向他们致敬!)给予女性与至今占统治地位的男性以在各个方面完全平等的权利。不过不应该与目前社会的恶劣状况相比较，并据此来判断共产主义的优点；如果共产主义允诺个人精神自由比现在实际上不能算是自由的人们拥有的自由多一些，那是不够的。问题在于，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还有没有任何的个性庇护所，社会舆论是否会变成暴君的桎梏，每个人完全依存于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人监督一个人，是否会把所有人的思想、感情和行动弄成单调的、清一色的。尽管在教育 and 生活方式方面比共产主义制度之下有更多的差异，而且现在个人完全依存于群众的程度比在共产主义制度之下要少得多，这种清一色已构成当今社会的时弊之一。否定独创精神的社会不能称谓健康的社会。人类天性的多样发展，各种各样的不相似、爱好、才干和各种观点之差异，人类生活大部分利益有关的甚至是精神和道德进步的源泉，能够激励争论的智慧并赋予每个人如此多的他自己想不出来的见解的这种差异，能够与共产主义理论同时并存吗？这就是还需要研究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的评论只限于构成社会主义极限的共产主义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不仅生产工具、土地和资本为协会所公有，而且按照各种平等原则在成员之间分配产品和安排劳动。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公正的或不公正的异议，都竭力针对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其它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共产主义之处，首先在于它不光依靠尊重工业的感情（按路易·勃朗的说法，就是 point d'honneur）^①，而出于个人金钱的利益，多少保留着劳动的愿望。认为报酬应该和劳动相称的制度，已与共产主义的严格理论不一样了。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的工人协会在法国进行了实践社会主义的试验，他们差不多全以平分报酬开始，不计各个成员完成了多少劳动量；但是，几乎在所有的场合，很快放弃了这种方式而代之以计件作业。共产主义原则本来要求更高的公平标准，并适用于人们高得多的精神状态。只有当劳动量的差别取决于本人的意志时，按劳动量付酬实质上才是公平的；如果取决于力气或能力的自然差别，那末，这种报酬标准本身就不公平：它付给已经有了的人，把大部分

^①这是法文中英文的 point of honour，可以译作：有关体面的地方。——译者

供给天赋高于别人的人。不过它有利于反对在现在的道德水平之下形成的、而又由于现在的社会制度而发展了的利己主义；在新的教育没有唤醒人们以前，这种报酬标准迅速成功的可能性，要比更高的理想的大得多。

通常反对共产主义的异议，对两种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即圣西门主义和傅立叶主义，完全不适用。对这两种制度能够专门提出另外一些异议。公正地说，这就是过去和现在看得见的伟大精神力量和一些基本的社会和道德问题广泛的哲学答案之最杰出表现。

圣西门理论不考虑平等，而打算产品分配中的不平等。它希望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志愿或才能从事不同的工作，而不是所有的人都做相同的工作；每个人的职务就像团长一样由统治政权任命，而报酬，则由该政权按照职务的重要性的个人贡献发薪水。管理机构可根据不同的原理而并不破坏制度的本质来建立，它可以由社会选举产生。制度的制定者认为，当权者是卓有才能和忠诚的人们，他们由于自己智力的优越使自己的政权得到其他人的自愿的赞同。应该设想，在社会的某些特殊状况之下，这种制度可能是有利的。历史指出了类似的制度下成功经验的范例，这就是我已经谈过的巴拉圭耶稣会教徒的范例⁵。文明的和有教养的人们由财产公有制团结起来，在自己聪明的统治之下，领导了这样一种野蛮人部落，一个我们还不知道任何一个像他们那样极其厌恶一贯地为遥远的目标而劳动的部落。他们恭敬地服从这些人们的绝对权力。这些人们教会他们文明生活的技术和为公共利益而劳动，这些野蛮人怎么也不会为自己进行这样的劳动的。这个社会制度存在不久，过早地被外交决议和外国力量破坏了。之所以能够实现，大概是由于少数执政者和全体受支配者之间的智力发展和知识之巨大差别，以致在这两种程度之间没有社会的或智力发展的中间过渡。应该设想，在别的情况下这种过渡根本不可能成功。它是当权者（同这个制度的创始人的看法相反）(contrary to the views of the authors of the system) 的完全专制为前提的。如果政权信赖的人定期由人民选举产生，这一特点也不会有多大改变。不过，假定不论如何选出一个或几个人，他们依靠某个二级政权组织，可以按照每个人的才能委派工作，并按照每个人的贡献分配报酬，在公社成员之间很公平地分配财产，假定全体成员对他们如何使用自己的权力十分满意，而且甘心情愿服从他们，对于这种设想简直不值得去反驳，因为它显然是空想。人们能够毫无怨言地服从一定的规则，例如平等规则，或偶然性或外在必然性¹¹。不过，几个人在自己的天平上衡量每个人，根据他们的意图和判断，想给某个

人多一点就多一点，而想给另一人少一些就少一些——如果不把这些人们算做高级动物，不害怕他们的超自然的威力的话，这点是人们不堪忍受的。

在所有社会主义形式中，最巧妙和最有先见之明地面对一切异议，建立了所谓傅立叶主义。这种制度既不想消灭私有制，更不想取消继承权；恰恰相反，它正式地把资本与劳动相等作为产品分配的要素。它希望在自己成员选出的首长管理之下，有2千名同行进行工业作业，在方圆一平方英里的范围内共同劳动。分配时，先配给每个公社成员一定量最少 (minimum) 食品，不管他能否劳动都一样。剩余的产品按事先确定的一定比例在劳动、资本和才能三要素之间分配。

公社的资金可以不同的数额归不同的成员所有。在这种场合，他们完全像在股份公司一样得到相称的股息。按每个人所在不同工人小组中的级别或地位，来评价每个人应得的与才干相称的那份产品。所有这些等级全由公社成员选举产生。得到报酬之后，谁也不必把它用于某种与别人有关的经济业务；每一个希望以自己单独经营为生的人，会有单独的经营。只有当协会全体成员生活在一座大楼里，为了爱护建筑物中的也爱护家庭生活各方面的劳动和费用，为了使公社买、卖由一个经纪人进行，以减少目前正被善于经商的人们侵吞的大量产品，只有这时才需要共同的生活。

至少在理论上，这种制度并不排除当今社会上存在的任何事业心，像共产主义废除它们那样。正好相反，如果组织将按照自己的创建者的意图行事，那末，它甚至会加强这种事业心：每个人将确信个人能够享用提高自己技艺和增强自己精神上或体力上的毅力而换来的果实。这种信念比当前社会制度下任何人的都强得多，除非这些人处在太有利的地位或得到命运的特殊赏识。不过除了这些劳动动机以外，傅立叶主义者还有新的，他们认为已经解决了使劳动招人喜欢的伟大而又根本的任务；他们非常有力地证明，这个任务是不难实现的；其中有个证明非常重要，与欧文主义者的有相同之处；他们说，在人们为了生存而完成的最繁重的工作中，未必能找到像那些生活有保障的人们为了娱乐而心甘情愿地劳动那样繁重的劳动。这个事实确实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社会科学的人可以大受教益，然而容易夸大从中得出的结论。如果工作非常令人为难和疲劳，而许多人自愿把它当做消遣来完成，那末，怎么见得这些工作是消遣呢？其实，因为人们心甘情愿、醉心于它，当然也会随心所欲地抛弃它。摆脱一定境遇的自由，往往是这种境遇的不愉快和愉快的全部差别。生活在同一城市，同一条街道，同一栋房屋，从一月至十

二月没有任何搬家的愿望和想法的人当中，如果命令他们困在这所房子里，许多人就会发现在此生活是不能忍受的监禁。

按照傅立叶主义者的意见，未必找得到这样一种有益的劳动，它实质上是不愉快的，也就必然不愉快。如果他认为不愉快，这是因为他或者认为是屈辱性的，或者是过分的，或者毫无引起同情和竞争的诱人之处。他们声称：在既没有有闲阶层，也没有象现在这样大量地把劳动浪费在无益的事情上的社会中，在为了努力增产和节约开支而充分利用大伙力量的社会里，谁也不必过量地劳动；按照他们的意见，当社会集团从事全部劳动，每个人可以按照个人愿望同时属于任意几个集团，而他在集团中的地位则按他能够给集团带来利益的大小由自己的同行们评定时，便可以找到使劳动成为富有吸引力的必要条件。根据爱好和才能的差别，傅立叶主义者总结说：每个公社成员将属于几个从事不同的脑力或体力劳动的集团，并且每个人可以在每个集团甚至几个集团中占居高位。这样做的实际结果是平等，或者初步看来，至少是接近于平等的状况。它的产生不是由于排斥个人才能，正好相反，是由于每个人的各种各样的才干得到了最高度的发展。

甚至从如此简单的介绍中，读者应当看到，在目前道德和智力教育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下，这种制度连一个控制人类活动的基本法律也不违反，说它不能成功或不能实现其信徒们寄予它的大部分希望，则未免太轻率了。但愿傅立叶主义和所有其它形式的社会主义，能像他们正当要求的那样，有机会在实践中检验。他们都可以在小范围中实践，除了参加实践的人以外，对谁都没有任何危险。实践应当解决：哪一种可能的财产公有制度，在什么程度上能够、以及是否很快能够取代按私有制原则占有土地和资本的“工业组织”，而现在，我们是并不想给人类才能继续发展规定极限。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政治经济学家们还应当主要研究以私有制和个人竞争为基础的社会生存和进步条件。并且人类发展现阶段的主要奋斗目标不是推翻私有制而是改进它并使社会上每个成员从中得到益处⁶。

在这里，我们既不打算阐述所谓社会主义理论，也不打算阐述所谓共产主义理论。我们仅就穆勒论述它们的调子，以及上面引证的最后一段话，说上几句。我们只补充一点，就连这一点也不是理论上的，而纯属历史的补充。

自从这种倾向在精神生活中占居了固定的显著地位以来，对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经济评论的公认的腔调，已经改变过不止一次了。1848年以前，大量的稳健的进步党党员，其中包括差不多全部政治经济学家，以殷勤的宽容态度谈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就象谈论善良的幻想家一样，后者虽然误入迷途，却又以自己的谬误在解释真理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他们——稳健的进步主义者。他们有时自以为巧妙地嘲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并不激烈，更多地是为了消磨时光，不过仅仅是有时这样，不十分经常也不十分多。他们是小人物。

在1848年，凡是发生变革的地方，都可以或多或少地从中看到，或者所有的，或者相当大的一部分贫民群众有某种不甚明显的彻底推翻现存经济制度的倾向，这种倾向看来与共产主义相类似。同时发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先的捍卫者们想要在著作中利用这种甚至连最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不是从前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也要谴责的倾向。这样一来，就向所有的人暴露了：在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与所有其他党派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甚至比其他相距最远的党派之间的区别还要大得多。专制制度的信徒和红色共和党员这时感到，他们两者有某些共同之处。这些正是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所反对的。而这些看来反对制度（учреждение）——它不论对反动派还是对广大革命派，都是同样宝贵的——的人们，在某些方面与获得对社会的统治权的人关系密切。例如，巴敦起义的领袖黑克尔和斯特鲁贝曾是社会主义者⁷。本来他们已占领了巴敦，后来被向他们推进的普鲁士军队所战败。当然，主要的危险根源是法国。临时政府认为必须逢迎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以便赢得时间。这种狡猾的手段看起来如此真诚，好象它让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参与国家管理。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然而，在临时政府成员当中的路易·勃朗的名

字，以及卢森堡会议，或者欺骗了这位虚荣心很重的胆小鬼（如果他是虚荣心很重的胆小鬼），或者逢迎了这位忘我的公民（如果他是 不想用内战使自己的政党取胜的忘我的公民）。但是共产主义的敌人设立的民族作坊，就象反对共产党人的营垒，可是还十分狡猾地说成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⁸，这些已经足以使整个欧洲大喊大叫：“共产党人掌握着法国政府！”随即掀起了大规模的六月起义，该起义只经过连巴黎内乱中也不曾有过的这种顽强战斗之后，才被镇压下去。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人们一提到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就非常害怕。在那个时期，无论谁连一分钟也不能摆脱这个念头。在那个时期，不诅咒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话，哪怕只有一页也写不出来。政治经济学传染上了社会主义恐怖症和共产主义恐怖症（自然，是在那些发生变革的国家以及随声附和的国家，英国人保持了一些冷静）。骂人是赋有强大生命力的情绪。胆怯也如此。大陆上政治经济学家们既已开始咒骂并惧怕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还来不及在自己歇斯底里大发作之后恢复常态。但是 10 年或 12 年是相当长的时期，在此期间不会不发生甚至对练习歇斯底里的人们也有强烈影响的事件。这时确实发生了对大陆上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多少有些影响的两种现象。十分固执的作家蒲鲁东在著作界占据了非常显著的地位。他是怎么样的人，是社会党人，不是，是不是共产党人，这一点大陆上的政治经济学家谁也不会辨别，也许就连蒲鲁东自己也并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大家都知道：他骇人听闻地咒骂，如同恶虎扑食般地咒骂，无可挽回地象个蠢人。他咒骂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这还好；但是谁要是试试说些反对他们的话，他就会这样痛斥这位先生，能使其生活都不愉快：“如果我把他们叫做蠢人，这是另一回事——我理解他们；而你们，阁下，并不理解他们，你们自己比他们要蠢得多，就连你们对政治经济学也一窍不通；你们算什么政治经济学家！你们简直是在

胡说八道”。所以，政治经济学家因为当场骂了共产党人，害怕下次再要面对这种怪物，就不敢不对共产主义露出微笑以请求宽恕。这儿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共产主义受人欢迎：谁不想受到一点欢迎呢？就是这位政治经济学家，在他骂完共产主义之后，还要添上一句：“就说只有我是这样反对极端和乌托邦的，至于新倾向的合理部分嘛，我爱得无以复加。”他还称赞协会，预言它有远大前程，喋喋不休地连他自己也搞不清在说些什么。可见，现在评论共产主义流行声调是狂怒与甜蜜的微笑、咒骂与恭维的混合物。

这种东西，穆勒一点都没有。他非常冷静地看待使别人非常害怕的理论，并且没有从其中看出什么可怕的东西。他在重新考虑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异议之后，连一条有根据的异议也没有发现。他关于共产主义的最后结论是：如果私有制将是完善的，——何以见得？——它可能比共产主义还好呢！不过目前这种形式的私有制远不如共产主义。他对社会主义寄予更多的同情，不但没有从中发现不好的，而且也没有发现不妥当的。他只提出一个疑问：当前社会道德水平非常之低，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人们是否有能力接受任何良好的制度呢？自然，这个怀疑是很有根据的，应当说，它不仅适用于有关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而且完全适用于有关任何重大改进措施的任何问题。例如，英国人统治东印度，能否向印度人引进比当前制度无比优越的文明制度呢？“在现存的社会道德状况之下，在东印度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能否废除从非洲向美洲输出黑人，以使黑人民族不再因为争夺俘虏并把他们卖到外国去而互相残杀呢？“在黑人民族当前状况之下，这是非常令人怀疑的！”如果不采取傅阿德·帕沙^①的可怕的严厉办法制止残杀，能否让德鲁兹人和马罗尼特^①人不再互相残杀呢？“在他们现在的这

^① 德鲁兹和马罗尼特都是住在中东的民族，前者现在还有居住在叙利亚的。
——译者

种风气之下，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然而，那是野蛮的和半野蛮的国家，关于文明的国家您考虑考虑好不好？能否指望耶稣会对大部分法国人失去任何影响¹⁰？或者指望英国平民开始像法国人那样对待自己的妻子呢？或者让德国人抛弃在他们之间传染腺病的自己极坏的厨房？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仍然是：“在目前这种状况下，这是非常令人怀疑的。”

就这件事吗？只有在一些重大事物中迅速、全面地改良的可能性才令人怀疑吗？不论选什么蠢话，任何蠢话中它都是令人怀疑的。例如，能否迅速做到，让彼得堡或莫斯科的招牌不以文理不通为特色？或者让俄国股份公司股东例会表现合理？或者让俄国杂志采用相同的正字法，使在一些杂志中间同样的字都用大字，而在另一些杂志中都用小字，使在所有的杂志中不论怎样都写成一样的，或者“тельга”或者“тълга”？或者让英国人弄到茶炊这个他们自己认为非常方便的茶具，来取代目前自己不称手的泡茶方法？或者让他们放弃在报纸上用特殊字体，所谓用于标题的大字母标上自己名字这个不体面的习惯？或者让德国人抛弃每个名词都大写的古怪习惯？或者让法国人弄来很好的类似英国的暖炉，或者类似德国人挺好的炉子以取代自己毫无用处的令人冻得发抖的暖炉？看来，所有这些愿望都是容易实现的，但是应当明确地说，不能指望每个愿望都能很快实现。

“自然，世界上什么事也不是一下子就做成的。”如果事情进展虽慢，但是不停顿，不失败，不回转到原处，那还算好的。只有不重要的事情才是这样进展的。在重大事件中，在许许多多失败之后才能成功，并且在每个前进运动之后，反动势力都接踵而至，如此顽固地迫使事业倒退，只有全力以赴才能战胜它，当然，在此之后紧接着就是疲劳和反动势力的新优势。

有这样的人，他们在任何个别情况下并不期待成功，而只知道

终于会成功。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不能怀疑它:其必然性精确地证明了这点。在俄国普及识字了吗?怀疑这点简直是愚蠢的。不过要是你愿意,你可以期待创办每一所星期日学校¹¹之失败,要是你愿意也可期待,现在一切有利于星期日学校的运动也会遭到任何失败——这是为什么?仅仅因为失败了没什么可丧气的,应该预见到它。但是期待失败,那还怎么着手工作呢?就连对它的兴趣都没有了。够了,好像这和我们思想有关:我们是否开始有兴趣呢?要是一个人对自己说:“我不打算做这个”,难道就真的不去做?够了;看看自己每天的行为吧!我们每个人发了多少次誓言,比方说哪怕不再争辩理论问题?难道有谁在一个晚上说服了一个敌人?难道每次分手时他没有对自己说:“怎么,我真蠢,还是争论了!”或者难道我们每个人,没有发誓不相信世界上任何人,或不爱世界上任何人?然而,难道这些誓言实现了?是的,在头一个机会之前是实现了的,而当机会一来,天性便占了上风,——你又争论了而且又纠缠上了,直至衰老。而当你衰老时,其他人在你的位置上成长起来,遭到同样的失败,发出同样的誓言,并且完全沿着同样的道路走过来。因此,我们的上述观点一点儿也没有妨碍同意这个观点的人们实际忙碌的热心。但应当指出,我们绝不认为,大多数相信某个真理的人们,好象不能够在任何时刻发现,它准备在第一个适宜一点儿的场合进行一次试验就完全被实现。就在力求实现热爱的事业时刻,冷静地谈论其成功的可能性,——只有具有重大的经验,或者具有特殊的气质:冷静的头脑与热烈的愿望相结合的人,才能够做到。这一种和那一种人总是相当少的。其余的人,你是说服不了的:他们总以为,从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场合中,眼看就会出现一次这样的场合:一下子就能可靠地得到许多东西。因此,我们对最近将来的可能性的看法,不会使谁冷静下来。或者完全失败或者很小失败的前景,都不能使现在或将来分享它

的人冷静下来。因为他早就习惯于这种前景了，并且他的活动出自他全部天性的必然要求，而不是出自少年对自己的幸福或自己的年华的信念。轻信自己的幸福或自己的年华的人会因此而振奋，一旦丧失信念，便会心灰意冷，这样的人也不会接受我们严肃的观点的。但是，他允许我们不说出我们所没有的希望，允许我们按照自己的观点谈事物而不必迎合他。我们完全同意穆勒的观点，不能期待现在的根本的经济生活制度很快会被按其它原则建立起来的制度所取代。然而是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政治经济学家应当长期研究生活和进步的条件”，研究属于现在占统治地位的原则的条件呢？是这样的，不过不是穆勒对此评价的那种含义。自然，人类应该最多地研究自己的现状和最近将来的情况。但是人类将如何评论它呢？是根据他误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呢，还是他应当忘却这个标准，如果后者明天或后天完全不能实现的话。

你们有一个九岁或十岁的儿子，刚刚开始学习，他能很快进大学吗？你们原来想，总有一天他应当上大学；你们以为，这对他来说是再好没有了；而现在呢，难道你们没有这样安排对他的全部教育，让他能够进大学并且避免不必要的拖延吗？当他问你们，为他最好预备些什么的时候，——难道你们不告诉他是进大学吗？如果他不断地听到同事、更多地是他认为比自己聪明的人们的蠢话而把他弄糊涂了，他就会跑来问你们，是不是当个骑兵士官比大学生更好些呢？莫非你们作出满意的决定真的放他走：“我们过七年以后再和你谈这个问题吧。”或者在类似的场合，你们也是这样明智地行事的吗？或者你们可能还要理智些，随声附和小孩，好像要是当个大学生挺不错，那末对他来说当个骑兵士官更有利，就会说：“让我们真的试试吧，也许确实不错，如果不好——那就再去上大学吧！”

有理性的人大概不会这么办的。不论目标远近，反正是忘不